

长城外围“集家并屯” 后的抗日斗争

张士奇 郝本春 供稿 曹玄庆 整理

1945年夏历六月初四，最大的灾难降临在张家坊全村人民的头上。

那是全国人民起来抗战的第八个年头，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到了穷途末路、面临全面崩溃的时候。日寇和伪满汉奸为了挽救其濒于灭亡的命运，企图垂死挣扎，因而频频向我绥中县西部八路军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讨伐”。张家坊就是他们视为眼中钉、早就想要毁掉的一个村子。

张家坊在绥中城西100余里的山区，南有大石河，水流湍急，塔子沟河横贯全村，海拔800余米的龙门山就在背后，是万山丛中一个河谷，虎踞龙盘，十分险要。由于敌人实行集家并屯，塔子沟和边沿子的村民都集中在这里。敌人在这里设有警防所（1945年正月撤了），要劳工、征“出荷”，在敌人残酷的统治和掠夺下，人民生活十分苦。我八路军从1944年起，由青龙到这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临青绥办事处主任信修、绥中县县长华裕民、四区助理高云霞等，常到龙滩、塔子沟这一带工作，宣传抗日，组织群众，收集情报，采办物资等。1945年六月初，我十一团六大队经张家坊塔子沟西去，留下两个连协助地方工作；张家坊的伪甲长张永平和小山口伪甲长刘长林把情况报告到永安国境警察署，警察署特务系主任孙凤润用电话报告县警务科，并建议给八路军一个下马威。警务科当即下令向

张家坊“讨伐”，并火烧村子。孙凤润向警察署署长吕世友传达警务科命令时，为了保密，没用口说，只是在纸上写了“火”字。

讨伐队的兵力，主要的是长驻山海关东大营的日本关东军守备队一个中队；其次是永安国境警察署署长吕世友兼大队长的讨伐大队，属下除警察外，还有常备自卫团200余人；他们武器精良，装备齐全，带有小炮、机枪、无线电台等。

六月初四，敌人兵分四路，向我老根据地塔子沟、张家坊进发。讨伐大队中队长于会川部由西面进攻，日本守备队由小山口的杨田北沟进攻。警察和自卫团等则从康家坊进犯，还有一股日寇从白枣林子调来，经小杨树沟、蟠龙沟方面兜剿，到张家坊会合。向导是永安村自卫团长刘长玉（小山口人，曾在张作霖手下做过营长）。

在这以前，我六大队得到了日伪要来骚扰的情报，由于考虑到地方武装枪支弹药不足，敌我兵力悬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半夜主动转移到霍家沟。同时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张家坊的青壮年妇女携儿带女躲上山，壮年男子拉牲口搬东西，成群结队逃出村子，只有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看守家门。

敌军进村了，日本军官令士兵到各家各户搜索八路军，却一无所获。恰巧有该屯张国如的母亲捡了一枚手榴弹，因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交给了伪自卫团长刘长玉，刘长玉一见此物，如获至宝。他为了在日本主子面前请功受奖，立即转交给日本军官。日酋由于讨伐扑了个空，围剿八路军的计划破产了。正没好气，看到了手榴弹，断定是八路军到这里时遗落下的，立时迁怒于老百姓，便向张家坊的人们发火说：“你们说八路的没有，这是什么的干活？”说完下命令，叫士兵们把全屯所有房屋，连同东西物件一齐放火点着，鸡犬不留。警察署长吕世友曾表示不应烧光全村，当即被日酋打了两个耳光。

需要说明的是，1944年伪满在永安建立国境警察署时，曾从各村屯征集民工，我抗日根据地武装派侦察员白玉珍伪装民工去做工作，伪警察署长吕世友经白玉珍教育开导，认清了形势，看出日寇大势已去，危在旦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为了向人民靠拢，减轻罪责，他平时约束部下较严，伪警有鱼肉乡民的，常挨他打，他还有一次打过日本警察官小端，因此有“吕大巴掌”的称号。

伪军们从四面八方点起火来转眼间烟云弥漫，火光冲天，全体村民的房屋家财，顷刻化为灰烬，甚至獐獐冲的伪甲长王锡均从他住在张家坊的姐姐家抬出来的箱柜，放在南河滩上，被日寇发现，也烧掉了。偌大一个村落，成为火海一片，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直烧得老树成炭，磨盘两半，村民面对敌寇暴行，心中愤恨已极，却因手无寸铁，无力反抗，只好忍气吞声。这次惨无人道的兽行，烧毁了张家坊，包括塔子沟、边沿子集中来的居民，共百余户，房屋四百多间。

那股从蟠龙沟方向来的日寇，拂晓时，从窟窿山后迂回过来，企图包围我八路军。他们在险峻悬崖峭壁间，灌木杂草丛中爬上又爬下，却一个八路军也没搜索到。当时为十一团带路的周永田、周文元和李长春3人回来，到边沿子立即向塔子沟南窟窿山冲去，恰好两个鬼子搜索到了窟窿山，直到跟前，周永田才开枪阻击，两枪打死两个日本鬼子。等到日军大批上来时，周永田最后一颗子弹臭了，只将雨衣帽挂在荆棘上做伪装，越岭撤退。从小杨树来的敌人搜山、放枪，我工作人员刘福余中弹牺牲了。原来在另一处藏身的刘福余的胞弟刘福良，见到哥哥身亡，就和刘庆安二人抬着他的尸体撤退，他们不幸也被敌人打死了。

日伪继续分头搜山。在窑沟山，敌人抓住了张永清，用刀

枪威逼他，用钞票利诱他，叫他说出八路军在哪里。张永清立场坚定，一个字也不说，翻译要打他，他痛骂汉奸走狗，帮助敌人打同胞，早晚要受到人民的惩罚。日本鬼子打他嘴巴，他赤手空拳捡起石头为武器，向鬼子奋力砸过去，打伤鬼子的脚，于是，张永清光荣牺牲在敌人屠刀下。

在里沟，张家坊的村民张永顺被打死了，事后人们只见他的毛驴在里沟门拴着，却没找到他的尸体，经过几年以后，人们才发现他的尸骨还在山上。

这次因宁死不投敌，在山上被搜索出来遇害的还有：刘庆来的父亲刘元柏（边沿子人，被枪杀后又被砍了头）；张国先的父亲以及张国顺、张永恒等人。另外，张国均的三儿子张文汉，因不甘心被敌人残害，自己上吊死了。

逃进山里的妇女们提心吊胆，唯恐落到敌人手中。她们把自己怀抱的婴儿用棉花堵上嘴，以免发出哭声，有的人把驴嘴巴也绑上了，并且在尾巴上绑上石头，以免叫唤跳蹬，暴露目标。人们探明，日寇在搜山后一无所获，又不敢继续向塔子沟、龙潭方向进犯，当晚回永安堡了，这才扶老携幼下山回家。但是，哪有家啊！只有一片瓦砾场。人们悼念被害的亲人，面对赖以生存的房屋家产所化成的灰烬，痛定思痛，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真是悲声震地，怒气冲天。但是，当时我们正处在日寇铁蹄下，几家几户，无法报仇，只好有亲的投亲，迁往小山口、永安堡和桦甸冲，或者临时搭个小马架，借来粮米家具，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地度着劫后余生的日子。

（摘自《绥中文史资料》）

三

日伪在东北各地的暴行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h.com

辽宁省

日军炸毁三宝营

雷音动

1932年7月，盘踞在锦州、义县的日本军欲西进热河，派间谍石本权四郎曾两次到北票进行间谍活动。他第三次来北票时，被李海峰抗日义勇军新部杨廷录得知，向李海峰作了报告。李海峰经过周密部署，派杨廷录带几十名勇士，于7月17日在火车上抓住了石本权四郎。日本大特务落网，震惊了日本朝野。驻锦州日军气急败坏，立即组织武装抢夺，曾数次沿锦承线进军均被我抗日义勇军击退。

当李海峰的义勇军驻在北票三宝营子时，日军派人到三宝营子，妄图利用金钱引诱李海峰放回石本权四郎。结果，遭到李海峰严辞拒绝。

日军在差人同李海峰周旋之际，于同年10月9日，从义县发兵五百多人，向三宝营子进攻。兵分三路：一路由稍户营子向三宝营子推进；一路由尖山子围攻三宝营子；一路由水泉奔房申沟。三宝营子被日本三面包围起来。日军上有飞机扫射、轰炸，下有大炮机枪排射。由于敌人进攻突然而猛烈，义勇军难以抵抗，李海峰率部队押解着石本权四郎，顺南梁撤向巴图营子，义勇军全部离开了三宝营子。

日军500多人向三宝营子进击，蜂拥着冲进村，扑了个空，便报复性地向老百姓开刀，一个个日军冲到各家各户，抢掠贵重的财物，放火焚烧房屋，向手无寸铁的群众疯狂开枪。顿时，三宝营子火烧连村，熊熊烈火，尘烟滚滚；村街口上倒着惨死于日军枪下的男女老少，地上淌着殷红的血。日军嗥叫着，把村里所有的柴草垛、粮食和财物都放火焚烧，化为灰烬。一刹时，三宝营子村墙倒屋塌，变成了废墟。

三宝营子被日军炸毁后，时值民国21年，朝阳县政府（辖三宝营子），县长李振钧，县公安局长姜振国，分别于10月14日、10月15日向热河省警务处呈报了“三宝营子被日人炸毁情形”，其中写道：“日炸毙居民男女百数上下，炸毁房屋100余间”。

三宝营子惨案，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又一罪证。

本文资料来源：

①1988年7月查阅辽宁省档案馆有关热河省卷，民国21年10月30日来文、1187号“朝阳县政府呈文”。

②《喋血抗暴》一书“挺石本青史留名”一文。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东赤里赤人民不能忘记的历史

于万江 王恩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强占了

我东北三省。从此，喀左县的各族人民，便遭受了14年的血腥统治。血染东赤里赤村，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喀喇沁左旗实行“三光”政策的一起骇人听闻的罪行。

正是骄阳似火的季节，东赤里赤村前屋后、河道两旁，杨柳成荫，大地上一片碧绿的禾苗在茁壮成长。农民群众正在村头路旁、树荫下、炕头上预言丰收有望，整个村庄沉浸在平静和安逸的气氛中时，一场预想不到的大祸临头了：

那是1933年农历六月六日上午，从羊角沟方向窜来了日本警备队和伪地方保安队约300多人，先头部队已进入小河沿村南，沿途抢牲畜。小河沿南村韩老五扛活的韩国山，拿枪跑到赤里赤村河东焦仕明家，气喘吁吁地说：“小河沿那边来土匪了，正在村南抢牲畜呢！”。这时，在焦仕明家有联庄护粮头目邹立田、董怀，还有白万合、董万学、邹本三、夏永启等，正在结义拜把子，设宴吃饭。听说来了土匪，除董怀外，其余6人拿枪跑上了东赤里赤村南王八盖子上，准备抵御土匪进村抢掠。放了10来枪后再抬头一看，有戴钢盔的，有穿黄军衣的大队人马，这才判明不是土匪，分明是日伪军。他们正在摆开阵式，用机枪对准村庄进行扫射，已打得王八盖子山头碎石乱飞，硝烟滚滚。这6人胆寒不敢众，便持枪从山头上退下来。可是日伪军还在节节逼近，肆意地用炮轰击村庄，顿时炮声、枪声交织在一起，响彻山谷，撼人心扉。

接着，日本强盗像下了山的野兽一样，冲进了赤里赤村子里，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逢人就砍，见人就杀，甚至连鸡犬的生命也不能幸免。

村南第一家，张玉德听见枪声乱响，刚跑出大门，正碰上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士兵在门口，就被这个军官一战刀迎头砍去，张玉德在惨叫声中死去。怀孕8个月的张郭氏，眼见自己的

丈夫惨遭杀害，急忙从屋里往外跑，被另一个日本兵刺倒在屋门前，复又一刀，8个月的胎儿血淋淋地从母体内流出来，还在微微蠕动。坐在炕上的3个孩子吓得浑身颤抖，不敢动弹。一个日本兵一把抓住一个孩子的胳膊，从窗口扯到院子里，凶狠狠的一脚把她踢出大门外。那个日本兵又回身操起锄杠，朝着两个男孩子打了几锄杠，孩子疼痛难忍，连哭带叫的满院乱跑，日本兵狞笑着又举枪把他们打死。接着，便纵火把两间房子烧着了，房木塌下来把横在屋门前的张郭氏尸体烧得血肉模糊，全家5口人死了4口，只是被踢出大门外的那个女孩，越墙跑进庄稼地里，幸免一死。

又有几个日本兵持枪闯入村南头关帝庙内，一进庙门，就见一人在庙台上，随着就是一枪把他打死。又有两个日军端着刺刀窜入庙门，一刀刺死躲在周仓（佛像）身后的一个人，一枪击中关平（佛像）身后一个人的头部，鲜血飞溅在墙壁上（直到日本投降后这片血迹还在），还有一个躲在正殿关公身后，没被发现，幸免一死。这4人是外乡来村中讨饭的，寄宿庙内，就有3人惨死于日本军屠刀之下。死在周仓像后那个人，死后还咬牙切齿，敞怀露胸，右手紧按前胸刀口，血迹顺肋而下，身边一个荆条筐，内有空碗一个，墙边立着一根打狗棍子。这3人分明都是无辜的劳动人民，就这样含冤死去了。

李海臣，是个29岁的年轻人，被一个带有短枪的日本兵追打，连喊带叫地跑进年过花甲的邹积谦院内。邹老汉手扶拐杖站在院内，看日军要行凶杀人，老人用手比划不要开枪，可这个日军用手抓着老人胡子，比划着他是抓土匪的，老人连伸大拇指，表示李是好人。再三阻拦无效，日军终于兽性大发，用手枪将李打死在院内粪坑边。

在阵阵枪声中，又有两个日军窜入年仅24岁的王恩琛院

中。全家老少都躲在正房西屋内，日军一进院就拿柴禾放在东间，用火点着，顿时浓烟滚滚，腾空而起。两名日军又去抢柴禾烧东厢房时，王恩聚的妻、嫂乘机把两个孩子扔出墙外，手拉婆母从墙豁口逃出，幸未被杀害。王恩聚和他父亲、弟弟跳出西墙，向西山坡跑去。刚到半山坡时，被日军发现，连击数枪，其父和弟弟中弹倒下。王恩聚跑丢了鞋，光着脚跳过梁去。事后归来，父亲和弟弟的尸体被乡亲抬回家中，停在院内，已经血肉模糊，难于辨认了。11间房子被烧成灰烬，满院悲惨凄凉。

韩二粉匠的妻子，由于怀孕不便行走，拖着两岁的小风，领着4岁的女孩，急躲进麻地里。可是狗也随着主人窜进麻地乱跑，日军举枪打狗，认为里边有人，端着枪进麻地里，一刀扎死韩妻，4岁女儿扑在母亲身上哭叫着：“妈妈！妈妈！”日军随即对女孩就是一枪，枪声响后再也听不到孩子的哭声了。当人们来收尸时，两岁的小风还偎在妈妈的身上，含着乳头已滚成一个血孩了。

王文学的媳妇，住在村东边，她听村西的枪声稀落了，又看孩子少一个，就登梯上房，躲孩子。站在墙外的一个日本兵，举枪扣动扳机，王文学的媳妇应着枪声仰倒在房顶前檐，鲜血顺着瓦檐子流了下来。

在阵阵的枪声和口哨声中，日军们蜂拥到村头东河沿边，把从羊角沟抓来给他们领道的3个老百姓，也用刀戮死在河边草地上。

日本侵略者在东赤里赤村，仅用1个多小时就枪杀和刀砍死男女老少32人，伤5人。街巷院内，死尸东躺西卧，血迹斑斑。烧毁房屋59间，滚滚浓烟遮天蔽日。这一惊心动魄的惨状，使人见之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实甚目不忍睹。

当那些冒险逃脱生命的人们回来的时候，在东赤里赤的村子里不管是街上还是院内，都有血淋淋的尸体，房屋家产顿时变成灰烬，看不到一点生气，到处是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幸存者中有的人变成了孤儿、寡母，有的人失去了丈夫或妻子，真是家破人亡，生活无着。但是他们终于擦干了眼泪，埋好了乡亲们倒下的尸体，把血海深仇深深地埋在心底，强压怒火，挣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过着啼饥号寒的生活，一直盼到了“八·一五”祖国光复，中国人民才重见天日！

（董宝整理，摘自喀左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二车户沟的男人全被杀光

李清平 韩国祥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1932年6月20日，日本侵略者一支武装部队，从朝阳南部侵入哈拉贵沟一带进行骚扰。接着向东进至羊山，21日又从羊山继续向南进犯。当这部分日军行至二车户沟与龙潭沟交界处时，被驻守当地的义勇军察觉，义勇军团长王震协同联庄会长赵清泉，率领百余人的队伍迎头痛击。在激烈的战斗中，歼灭了以伊藤（日军司令）为首的日军23人，剩下的8名残匪狼狈逃窜。逃出不远到曹杖子后山，又被“王老雷”派人截住，击毙2人，其余6人惶惶逃回本部。

1932年6月23日，日本侵略者又从锦州派出一支武装队伍，到达羊山后往二车户沟进发，企图报复。当时，义勇军已离开这里去执行任务，只有当地武装群众和敌人坚持了一天的

战斗。虽然敌人上有飞机侦察、轰炸，下有轻重机枪扫射，然而由于我中国同胞斗志甚坚，抗拒甚烈，敌人屠杀二车户沟人民的计划未能得逞。遂退回锦州。

1933年“二·二五”朝阳失陷后，日伪统治机构相继建立。一些汉奸走狗协同日本侵略者，把侵略的魔爪向朝阳各地伸展，进行着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从此朝阳方圆几百里的地方，村村哀鸿遍野，户户母哭子啼，昼不安食，夜不能寝，背井离乡，以避抢掠屠杀之苦。

在“日本人要血洗三南区”的紧张气氛中，1933年秋前的一天，一股日本匪军从北部侵入二车户沟。这次来的敌人较多，步兵乘坐着汽车，停在下窝铺屯，开始点火烧了场院上的庄稼和下窝铺的房屋，约60户200多间房子全被烧毁。这时村内的人大部分跑到村外躲起来，未被杀害。

1933年11月9日，日本侵略者又派一股匪军侵入二车户沟。当人们听到汽车响声，就四处逃奔，有的往东沟跑去，有的往上沟跑去。杨玉铎和田凤岐正往地里送粪，未能躲开，日军就把这2名无辜群众开枪打死。接着，日军把逃跑的群众从山上圈回来，给大家开会，说：“好人的别跑，跑的都是红胡子，如果你们再跑，就统统的打死……”。敌人就用这种狡猾的手段，欺骗了善良的中国民众，稳住了民心。敌人说完后，真的没杀人、没开枪就离开了村子，到了11月的14日，一股日军坐汽车从东梁开过来。因上次敌人欺骗说跑的不是好人，人们并没识破那个阴谋而信以为真，所以这次敌人来了，群众真的没跑。敌人进村后抓住王勇和周延荣二人给带路，到龙潭沟去看碑（陈美营子村有人为讨好敌人，给前次被打死的伊藤等人立的纪念碑）。敌人看了石碑，兽性更加发作。第二天（15日）鸡叫后天刚放亮，敌人就开来了3辆汽车，载着60多名官兵，手扣枪机，

子弹上膛，刺刀闪光。趁民众大部尚未起床之机，包围了二车户沟，挨门逐户进行搜查。凡是搜出年在15岁以上的男子，见一个杀一个。枪杀、刀砍、刺刀挑。一刹时，屋里屋外、院里院外、街头河边躺满中国的男性成年人的尸体。也有少数孩子含着其母的乳头和妈妈一齐被害在炕上。有的人被割下头来，也有的一个人被打了10枪。就这样，一清早不到3个小时的功夫，二车户沟全村仅有的60几名男人，除3名外出者和郝文章、王世云钻到柴草堆中幸免遇难外，其余57名村民全部被杀害。在这次惨案中，王勇一家4个全部被杀，王彬一家爷仨全部遇害。

敌人走后好几天，外逃的人们都不敢回到村里来，被残害的遗体无人掩埋，有的尸体被狗撕坏；有的被砍得面目皆非，认不出是谁；有的身首分离，景象之惨，目不忍睹。后来，周围群众到二车户沟帮助掩埋了尸体。一时无法弄到棺木，就用板柜装敛尸体，柜用光了，就用席子卷埋了。

惨案过后，村里遭孤寡，有许多妇女精神错乱，见神闹鬼。有的人不敢进屋睡觉，只好几家聚居在一起住马架棚子。有一名大胆的周宽老人，每夜手拿一个木梆子边敲边喊：“没事了，快睡觉吧！”

人们在哀痛之余，怀念一位好心的中国同胞，一名姓邹的翻译。他随日军第一天到二车户沟时，他借借喝水之机，让下沟赵兴林给上沟传个信：“明天早晨有大事，叫人们躲一躲。”赵兴林又找到杨永孝，向上下村人转了这个信。可惜人们听了这番话不相信，并说：“日本人要杀人还告诉你？”（因信了敌人的“好人不跑”的话，所以没有躲避）并责怪传信人：“自己就害怕。还来吓唬人”。如果当时听信这位好心人邹翻译的话，或许会少死许多人的。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王砬沟的惨状

滕 韶

建昌县谷杖子乡吉杖子村王砬沟屯，座落在谷杖子乡西北15公里的一个5公里长的山沟里。该屯三面靠山，只有沟口是人们出入的唯一小道。在50多年以前，就有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住在这里，由于山多、柴草密、交通不便，外人很少到这里往来。

1933年（伪大同2年），日本侵略者侵占建昌后，一些抗日队伍——民众救国军、义勇军、仁义军等经常到这里来，和群众一起待机打击日本侵略者。侵略者也多次组织军警到这里来搜捕，但每次都遭到抗日队伍的回击。侵略者对此怀恨在心，并诬称该屯为“土匪”老窝。

1934年（伪康德元年）农历四月初七，日伪军300多人，由大队长林木率领，持有机枪、大炮，还有六七台卡车（汽车）在飞机侦察掩护下，从四面包围了王砬沟。日军进村后，按户搜查。当时，抗日队伍早已转移，他们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强迫集中在屯中间一个大井旁边的小空场上，男女各站一边，在群众周围架起机枪。这时，林木手拎刺刀，威逼群众说出“土匪”（抗日队伍）的去处。群众坚决不说，他就要命令开枪。这时，翻译给出了个“高招”（意思是把这里的居民都杀掉，“土匪”就不会再来了。再想抓“土匪”就抓不到了），当场群众才幸免一死。

日军走后，人们才发觉自己的亲人被杀害了。原来，这屯的居民吃过早饭去地里干活，日军刚一进村时，见人就开枪，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刺刀挑死，全屯有13人被杀害：

居民季学诚，被炮弹炸死，几天后死去。

居民季清芳，胸部中弹，也几天后死去。

外屯居民孙老头（居民李景新的外祖父），接女儿住家去，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半路上。

外屯居民李振发，来岳父家串亲被炸死。

居民季学用去地里干活，其子立东（12岁）跟去玩，日军将其父子同时挑死在地里。

居民季洪才被打死后，又将头皮剥下。

放羊娃李根带被挖去双眼，然后被挑死。

居民吉奎被杀，头上身上被机枪扫射弹眼多处。

居民李殿举同敌人搏斗，两手被刺伤多处，最后被剖腹。

齐永学（62岁），被挑死。

此次惨案之后，这里的群众又多次接待抗日队伍，不断对敌人进行突然袭击。第二天春天，日本军又派分驻所白所长，带警察到此把居民的房子烧着。警察走后，除两栋房子得救外，其余100多间房子和衣服、粮食等全被烧光。群众没吃的靠挖野菜维持生活；没住处，就在旧房壳子里搭起棚子住，有的住进山洞里。日本侵略者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地方的残害，这里群众的对敌斗争，一直坚持到祖国光复。

（建昌县政协供稿）

狂轰滥炸南营子村

李清平 韩国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下，大好的东北河山，不到三个月就大部分落入日本侵略者手里。到了1933年2月，朝阳地区也相继沦陷。面临这国破家亡的民族危急关头，全国人民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纷纷组织起抗日武装，自发地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朝阳人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组织起抗日武装——联庄会和义勇军，主动出击日本侵略者，阻止日军的西进。1931至1934年，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先后十数次和日军作战，共消灭包括伊藤司令在内的300多名日本侵略军，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4年5月，一支日本骑兵队约30多人，从羊山附近的南营子东胡同直奔村南而去。这支日军在羊山以西，遭到了抗日武装的截击，经过一场战斗，有7名日军溃退到南营子。当时，村中有人主张将这7名残敌干掉，但是有人却说：“这乱子惹不得，不叫他们进村就是了。”终于放任这7名日军进村，他们只好从村外向东北方向逃去。这为本屠杀南营子人民埋下了导火线。

到了5月中旬，又从南边开过来一支日本队伍，行至黑牛营子附近，被义勇军的团长和联庄会的会首王震、赵清巢等人察觉，他们立即率队迎击。经过战斗后，敌人败退突围，沿山路向朝阳方向撤退。撤至大四家子的东南沟一带，前边又遭到另

一支抗日队伍截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被我方打死数十名敌人，其余敌人突围继续向朝阳方向撤退。撤至北营子时，敌人想凭北营子垣墙房顶，负隅顽抗。王震、赵清泉已追至南营子，以猛烈的炮火把敌人赶出北营子。敌人误认为这次攻击是南营子群众发起的，又加之月初没让那7名残兵进村，两事合一，敌人恼羞成怒，决心屠杀南营子村人民。

1934年5月19日将要晌午时，从朝阳方向开来一股日伪军。他们乘坐一辆汽车，车开到南营子村北，就用大炮轰击南营子。群众发觉后，都纷纷跑向西山和东河套。这时又来一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侦察，发现外逃的群众就立即进行扫射。就在这种狂轰滥炸的配合下，大批日军进入村中，挨门逐户搜捕抓人，并在飞机侦察指引下，向西山追捕群众。凡是在离村较近处隐蔽的群众，不管是青纱帐里或在山坡上、沟内的，一旦被敌人发现，就用刺刀挑死或砍死。这次屠杀将要完结时，村里敌人开始抢东西、点火烧房子。

这次大屠杀共残害我无辜同胞27人。其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五六岁的儿童，有孕期的妇女。真是血溅沟壑，尸横田野。谢云奎一家9口，有7口被害，只逃出兄弟二人。当他全家逃出村外后，一直朝西边跑去，他的儿子谢硬生是一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年青腿快已跑上山顶。回头一看，敌人正在杀害他的父母和亲人，他立即从山顶抓起两块石头，直向敌人冲过来，敌人看见慌了手脚，就丢开别人，向他开枪射击，这位善良而勇敢的青年应声倒在血泊里。

这时，村里已浓烟滚滚大火熊熊了。日军的嚎叫声和火光照耀下遇害者的纵横尸体，构成一幅人间地狱图。

经过二三个小时的血洗，全村房屋被烧毁了400多间，整个一条后街只剩下一户人家。这一户是王三爷子家，因他年过八

旬，耳聋眼花，敌人把刺刀放在他的脖子上威胁他，他也不出屋，点起火来他就拼死扑灭。不知什么原因，敌人竟未烧他的房子，也未杀死他。事过几天了，从远处山岗上看到村内烟火熄灭，外逃的人们才陆续回到家中。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三辑）

柳杖子惨案

杨得胜 梅兰亭

柳杖子村地处建昌东北部，与喀左、朝阳两县交界，是谷杖子公社的一个山环溪绕、风景秀丽的山庄。这里原来住有34户百十多口人，分为上下两屯。上柳杖子14户50多口人，下柳杖子20多户80多口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大地区沦陷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这里的群众为了民族大义和全国人民一样，不甘心当亡国奴，奋起抗击日寇。他们有的参加民众救国军，有的积极支援抗日武装，有的抗捐抗税，给鬼子汉奸以有力的打击。凶恶的敌人哪能容忍人民的反抗？他们要拔掉柳杖子这个“土匪窝”，杀绝“暴民”。

柳杖子村的灾难终于降临了。1934年旧历十一月十二日这天大早，天还没亮，一群鬼子兵闯进上柳杖子，下令把全村男女老少，一齐赶到村东头庙前集合，挨个查手验肩，看有没有用过枪的，结果一无所得。最后一个鬼子军官通过伪军翻译官说：“土匪八路军来了你们要报告，不报告都统统的枪毙的有。”

敌人折腾2个多小时，打死了不少鸡禽和猪狗，才滚出沟去。

与此同时，下柳杖子则发生了灭绝人寰的惨痛事件。30多个鬼子兵来到村头，逼着贫苦农民柳宪生为他们带路。柳宪生宁死不肯，结果活活被鬼子挑死。这群畜牲更加气急败坏地向村里开枪开炮，狂轰乱射，一时间把这个小小山村炸得房倒屋塌，畜死人伤。鬼子兵闯进村后，指使恶狗咬人，很多人被军犬咬伤。这次事件，群众被打死1人，重伤2人，房屋被毁坏多间，其它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1935年旧历五月二十七日，日本强盗对这里又进行第二次烧杀。这天，人们刚吃过午饭，三十多个鬼子兵在一个叫岗本的头子带领下，又重重包围了这个山村。鬼子首先向村中开枪开炮，把这个僻静的村庄立即炸得天昏地暗，家家户户都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炮火停止以后，闯进村子的鬼子兵逐户搜查，惨杀我无辜群众6人，重伤2人。其中张国良（48岁）为了躲避鬼子向后山逃跑时，被鬼子打中，他当时没有死，被鬼子发现后，用刺刀活活挑死。一小女孩张小者13岁，小男孩张福长11岁，姐弟二人全被鬼子枪杀。58岁的张有也是穷苦人，因病直不起腰来，鬼子进村后他赶紧往后山坡爬去，也被鬼子发现一枪打中，当即死去，悲惨情景，目不忍睹。此外，重伤二人中杨刘氏60岁，听说鬼子来了，往后山坡爬，被鬼子打中腹部，鲜血流了满地。张高民25岁，见鬼子来了，也跑到后山被鬼子打穿脚心。

日本帝国主义在柳杖子的两次扫荡清剿，任意杀害我同胞7人，重伤4人，计死伤11人，占下柳杖子总人口的15%。

柳杖子村的群众并没有被日本的屠刀所吓倒。当1945年我八路军小分队又来到柳杖子村时，人们欢欣鼓舞支援小分队。八路军小分队出发时，梁为斗、张振志等主动给带路送到朝阳石

明信沟（王老凿处）。一次有一个八路军战士小宋负伤，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把小宋留下养伤。

曹振东老人今年八十多岁了，他是身受其害的历史见证人。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杀人的魔鬼，屠杀我们柳杖子群众时，我是亲眼所见，到啥时候我们也要记住这笔血债，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懂得国败民苦、国盛民安的道理，治家要爱国呀！”

（建昌县政协供稿）

日军制造的油房沟惨案纪实

作者：李学志

时间：1935年秋末冬初

李学志口述

李学志、刘守军整理

1935年秋末冬初的一天早晨，我正在院子里倒粪，忽然听到我们三家窝铺村的东树林子里响起一阵枪声。我立刻停止干活，随着村民们向东树林子奔去。当人们到了村口时，看到一队日伪军从东树林子出来，向东台吉营子方向走去了。待他们走远之后，我们来到东树林子里。一看，有4具尸体卧在树坑里，被枪打烂的胸膛，还在滴着鲜血。我们认出了死者，他们是离我们村十多里路远的油房沟村教书先生王希贤和王希兰哥俩，另两个是贫苦农民董福生和米存志。日本侵略者在我们这一带如此镇压群众、杀害无辜的事件已有多起，人们在心里牢牢记下了这笔血债。

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们三家窝铺、大四家子、油房沟等村落均归朝阳五区所辖，是二龙台川的下哨。自1933年来，以兰

天林为首的抗日救国军经常在这一带活动，他的爱国行动，对我们大黑山区的苦难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在人们当中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朝阳五区第一军，
军长大人兰天林。
顺天而做保真主，
杀了富豪济贫民。
群雄并起把国救，
义勇消灭日本军。
天从人愿成正果，
满斗焚香奉上神。

这首歌谣虽然带了一点迷信色彩，却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兰天林抗日救国军的拥戴。

兰天林抗日救国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了巧妙的游击战术，打得日伪军闻风丧胆。日本侵略军对兰天林的队伍和五区的人民恨之入骨，采取了“血洗五区”的凶恶手段，疯狂地镇压抗日救国军，残害五区的群众。自1935年8月开始，日军就集中了大量兵力围剿大黑山。在大黑山的九道川口都有日伪军驻防，尤其是地处五区的二龙台川大四家子村，就是日伪军的一个据点，大约有一个连以上的兵力驻防此地。他们在二龙台川无恶不做，肆意屠杀当地群众，据我所知，被他们无辜杀害的群众就有40多人（整理者注：据调查，被无辜杀害的人中已知道姓名的38人中，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12岁）。

油房沟惨案，纯属日寇一手制造的。日军在杀害王希贤等4人的头一天上午，有两个日本兵从四家子驻地出来闲逛，看到一个姓孙的农民正在用犁杖垒地，这两个日本兵非要用犁地的马骑着玩不可。这个姓孙的农民在他们的逼迫下，只好把马解

下来交给了这两个日本兵。有一个日本兵骑上马就在漫地里跑起来，另一个日本兵在后面哈哈大笑。可是，马见到生人是不老实的，一蹶子就把骑在背上的日本兵摔出去老远。当时，就被摔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了。日军送他去北票治疗，途中就断气了。日军长官在询问死者原因时，那个和死者一同去玩的日本兵，却用手一指，说油房沟那里有土匪，打了冷枪，把马吓毛了，才把那个人摔死的。

于是，就是当天晚上，在四家子驻防的全部兵力一齐出动，把油房沟村团团围住，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连推带打地押解到高油房沟村不远的冷家店村李家大车店里。夜里，日军对村民们逐个地拷打和审讯。经过一夜的审讯，也没查出打冷枪的人，于是他们就遵照上司命令：在天亮前，采取看手掌和摸心口的方法，把王希贤等4人揪了出来。他们说王希贤和王希兰手上没有茧子，肯定是打冷枪的人。又说董福生和米存志心跳厉害，是打冷枪的嫌疑犯，不容申辩，就五花大绑把4个人捆绑起来。这时，在冷家店村有一个妇女，说她是道徳会的会员，并以会员的身份为这4个人说情作保，却被日伪军用木棒打得头破血流。至此，再也没有人敢出面求情了，眼睁睁地看着日伪军押着这4人出了冷家店，向我们村的东树林方向走去，他们就这样被无事地杀害了。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四命顶一命”的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本侵略者在二龙台川制造无人区

王瑞林 刘香圆

二龙台川在北票西北部的大黑山脚下，川流由西向东，羊肠小道沟通着几十个自然村千余户人家，这里是劳动人民安居乐业的好地方。然而，“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对这里抗日民众进行残酷镇压，并在这里实行“三光”政策，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

1933年11月，兰天林在大甲营子又树起抗日灭满救国军的大旗，几个月的时间，抗日队伍就发展到千余人。他们奔袭各地经常打击日伪军的进犯，消灭伪军的骚扰。大黑山区人民也自动组织起武装保卫家乡，由于人心所向，不到1个月的时间，仅在北四家子乡以北的大水泉、王增店、陶家沟、榆树底等二十多个村庄就组织起4个联庄会。大家推选出会长，号召有枪的出枪，有马的出马，没枪没马的出人。从此，这一带的人民同大黑山区其它地方一样，庄庄联防，户户参战，白天设岗，夜间出哨，一方有敌情，各方去支援。联庄会组织起来后，各路匪贼和伪军再也不敢轻易进山骚扰。

此时蒙奸沁布多尔济（小王子）依仗日本人的势力，强令大黑山区解散联庄会，交出枪马，否则要血洗5区（当时属朝阳县辖），荡平二龙台川。抗日灭满救国军兰天林司令闻讯后，便派人给二龙台川联庄会送来书信，表示愿意协同各联庄会，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犯。山区里的人民一致同意让义军进

山。

1934年1月7日午时，南方山顶上响起三声礼炮，这是救国军进山的联络信号，紧接着两面1丈多高、6尺多宽的红地白字写着“抗日灭满救国军”的三角狼牙大旗出现在山顶上。同时，在进山峡谷西要道两面的山坡上，也扬起四面联庄会的大旗，4名联庄会长骑马并列在石门道口。他们对空鸣放一枪，表示欢迎义军进山。兰天林率领大部分马队和部分步兵共千余人，威风凛凛地走下山来，十分有秩序地开往各个村庄。义军所到之处，不打不骂，不挑吃喝，不动百姓分毫，彼此情同自家人。在春节期间，兰天林与当地群众协商，将二龙台川4个联庄会编为抗日灭满救国军的4个排，继续留在山寨，护村、抵匪、阻击日伪军进山扫荡。从此，兰天林将二龙台川作为抗日的根据地。

2月6日，救国军离开驻地奔袭大黑山其他各地，在联庄会的支持下，4个月与匪贼打20多仗，消灭了“林字”、“大周”、“小周”等匪军，为民除了害，并在1年多的抗日斗争中，联合了周荣久、苑九占、老梆子等抗日力量，转战在北票、阜新境内，打击日寇，消灭伪军，不断取得胜利。

1935年3月初，救国军第一支队在联庄会“上排”的协助下，缴下到三道梁收缴民枪的一伙警察的枪马。5月8日，联庄会“下排”又配合救国军的第十支队，在鸡冠山伏击了日军4辆军车，打死日军多人，缴获大量物资和枪支弹药。6月1日在克洛弯阻击了日军两辆军车，相继又在汤沟和东官一带多次与日伪军交战。7月13日，兰天林调动全军人马，攻克了贝子府，消灭日伪军和警察20多人，又击毙了王府里10余名炮手，缴获机枪两挺、步枪10余支、子弹若干。同时，又砸了3个大商行，获得了大量的军需给养。8月7日，兰天林指挥各路义军围攻北

票，威震百里方圆，惊动了奉天警察厅的汉奸和日本侵略者，他们调动朝阳、赤峰和通辽、阜新附近的所有日军和伪军1万多人，出动2架战斗机，20多辆铁甲汽车，于10月13日将大黑山围得水泄不通。救国军在兰司令的指挥下，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由于武器装备相差悬殊，救国军被迫于午夜，从大黑山的东部松树山尖处突出重围。

追击兰天林义军的日本侵略军离开后，紧接着大批警察开进各村。在二龙台川上游，警察们端着枪，驱赶着各村的老百姓，全部集中到王增店南面大河套训话。伪村长周凤在警察的护卫下，站在土台上嚎叫着说：“兰天林几千人马，都挡不住皇军打，你们联庄会几十条枪，还能挡几下打啊！这回你们惹下了大祸，皇军要血洗二龙台川，大人小孩杀个根芽不留。是我在皇军那里为民请罪，皇军才饶恕大家伙。但也有条件：一是各村要按户做钱赎罪，二是联庄会的成员交出枪马，三是惩办勾结兰天林的祸首。这是皇军的命令。”这个汉奸对群众训完话之后，警察们分别到各村，把有枪有马户的家产掠夺一空，并且在临走时还把这些户的房屋放火烧毁。

1936年初，日伪军曾多次进山烧杀。以长条沟为例，先后两次火烧，两次推墙，共遭受四次洗劫。其中一次是张宝山率义军从东边返回大黑山进入长条沟，随之有120余名日军乘4辆铁甲汽车包围了这个村子，敌人使用机枪和炮，把这个村庄打成火海，16名义军和村中没有逃脱的百姓全被杀害，最后从村中搜出个60多岁的李母，也被凶恶的敌人用刺刀捅死。死者的衣服全被剥光带走，尸体裸露在野地里。除张宝山尸体被偷走掩埋外，其他人的尸体任野狗吞噬叼走。

5月24日，有一帮日军和警察闯进三道梁子，据说一个日军挨了一枪，他们便气急败坏地冲进油房沟，将大人小孩全部

赶到三道梁村，围进一个大猪圈里。在猪圈的四周架起机枪，准备屠杀，后经抻头人向伪军再三肯求才幸免。但日军仍不肯善罢甘休，指使伪军将王希贤、王希兰、董福生、米存志拖出人群，硬让这4名无辜者为日军抵命。这4个人怒视着敌人，最后倒在血泊里。翌日，日军将小四家程永和及其3个儿子抓来，硬说他们爷四个同兰天林有联系，将他们枪杀。东荒的徐仁，不忍日军暴虐。利用叶子会给群众治病的机会宣传抗日，后叛徒告发，也被日军砍头示众。

5月26日，日伪军又闯进王增店，抓住王景阳，硬说他私通老兰，有枪有马，将他绑在板凳上，往鼻子里灌着火油和辣椒面子的凉水，王景阳被日军灌得鼻孔往外冒血，最后悲惨地死去。没过几天，王海、王景、苏九、解贵、李士宽等都被抓住，带到黑城子王府灌凉水、压滚扛，这些人相继被摧残致死。

7月末，日军在大黑山集家井村，制造无人区，勒令居住在二龙台川上游的20多个自然村居民，限期10天内扒掉全部房屋，否则以通匪论处。8月3日，日军讨伐大队长、刽子手佐藤，他突然带领近百名日伪军，驱驶两辆铁甲汽车开进山区，先是机枪扫射，而后放火烧房子。屋内的衣物、粮食及牛、羊、猪、鸡一扫而光，全变为灰烬。

在大火过后，村民们又从深山密林里偷偷地回到村子里，重建家园。这年冬季日本人署官大平，又带领7个日军和伪队，从山外白搭子等地强制赶来500名老百姓，带着镐头、铁锹、木杠子进山到各村扒房子。敌人先是放火烧，而后推倒残墙断壁，仅用两天时间，20多个村庄的几千间住房和牲畜棚荡然一平。

日军逼得人们无家可归，大人孩子嚎哭彻天，有些老年人佝偻气喘，步履蹒跚，倒在雪地里；有的孕妇在婴儿落地之后，

滴水不进惨死在路旁的山坳里；有的妇女被日本强盗剥光衣服裸体照相，轮流奸污，最后被他们在狰狞面目的笑声中用刺刀挑死，或含羞自寻了短路。在郭家湾附近村子200余户人家千余口中，含恨死去百余口，其余的人都被赶到郭家湾。日军又怕郭家湾同救国军有联系，又从山外抓来几百民工，在郭家湾村四周挖200丈长、9尺宽、1丈深的沟壕，并在村口修上木板吊桥，早晨放下，晚上吊起来，由伪军看守。村民出入要手持木牌，外来亲友要详细盘查，如有不周就被当成义军探子抓起来。这一年瘟疫又流行，许多人被染上伤寒霍乱。警察“狗子”不准人们外出求医，十几天死亡20多人。有的户逃到外地给人家做零工糊口，趁夜间回到山里讨弄地。1937年秋，石头梁子村的人们，分别从内蒙回来收秋，结果被汉奸报告给日军，日军和警察把群众场院的庄稼垛都点着火，火光四起，黑烟滚滚，燃烧两天两宿。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大黑山制造的无人区，这就是二龙台川无人区的悲惨景象！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血洗南岗头

姜开田 张春发

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后，在各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血洗安东县的南岗头（现辽宁省东沟县内）就是其中的罪证之一。我们俩就是那次事件的幸存者。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义勇军邓铁海、阎生堂的队伍经

常化装成各种人物出现在安东、凤城一带，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南岗头是一个小堡子，共有三十六七户人家。义勇军阎生堂部队的王队长、那队长、宁副官经常到这个堡子活动，有时就住在王忠学和姜春田的家里。

当时，南岗头有1个人，叫宋政祥，在安东县日本人开设的迁山梗米所做职员。1936年农历八月，宋政祥在探家中听说阎生堂的队伍常住在南岗头，回到县里就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又报告了日军守备队。

1936年12月14日，日军守备队在南岗头附近的小姜堡子场院窝棚里，搜捕了义勇军战士于德新、齐小惠二人。晚上日军守备队和安东县伪警察局张局长带领100多名日伪军，把南岗头附近的150多个男人绑起来，押到离南岗头七八里的红土山姜云枫院里。第二天上午，又把红土山和附近的宋家坨子、马家堡子的男人都绑到红土山，前后被抓去约300多人。我俩也被抓去。伪警察局张局长挥着战刀，威胁说：“马胡子（指抗日部队）来了，你们要马上报告，不许给他们饭吃，不报告，就杀你们的头，烧你们的房子。”大家只是怒目而视，都不吱声。在张逼问能不能做到时，也有人应付一声：“能！”张又向被抓的人说：“有没有王队长、那队长？说出来可以保命，不说实话保不住命。”大家说：“没有！如果有，我们就说啦。”张就把宋大粉匠从人群里拉出来问：“你就是王队长！”宋不承认，被打了一顿，又灌了凉水。张又问大家：“他是不是王队长？”大家说：“他不是，是宋粉匠。”这才把他放了。这时，听见王忠学在后屋被人打得直叫喊。张最后又说：“把马胡子带来，逐个地认，看谁‘通匪’。”接着把于德新、齐小惠押出来，叫我们摘下帽子，一个个地从他俩面前走过去。日军和汉奸在前后监视着，结

果敌人一无所获。下午伪牌长吕长久被留下押送到龙潭，就把大家放回家了。

第二天，天刚放亮，下着小雨，日军守备队友枝、牧野和安东县伪警察局张局长带领守备队十多人和“自卫队”100多人，把南岗头团团围住。然后到各家搜查，不分男女老少，被赶到姜德春院里。这时有个自卫队的人喊：“谁是那队长、王队长？赶快出来。”可是，没有应声的。自卫队又再三威吓，群众中有些人说：“没有”。这时日军翻译又问群众：“谁是马胡子，马胡子来没来？”群众不吱声，他们又把牌长吕长久叫出去审问、灌凉水。最后，伪警察局张局长又说：“姓宋的都出来，谁是串门的出来。”姓宋的，就是指宋国本和他的本家共20多人，都出去了。有个叫雷景春的，外号叫“雷大彪子”说：“我是串门的。”他也出去了，还有两户朝鲜人也被叫了出去。

余下的人，男的每8个人绑在一起，带到姜德春的后院的东头。自卫队把一间屋子的窗户打开，窗台前放一条凳子，叫被绑的群众一起踏着凳子从窗外往屋里进，走到炕沿时，日军就开枪把这些人打死。再逼赶另8个人往里进，又开枪打死，就这样一批一批地进行屠杀。

当时，姜德春的年纪很大。他和于天发、许恒志等人在后，一看进去是死，不进去也是死，干脆就切断了绳子和日伪军撕打起来，姜德春被日伪军用铁锹砍昏了过去，于天发后背挨了一刺刀，许恒志左腿被子弹打穿，他们都倒了下去，被“自卫队”拖到屋里。过了一会儿，他们苏醒了，挣扎着爬起来，摸到后门口，跑了出去。许志恒因流血过多，不到半月就死了。有个外号叫“杜疤拉眼”的，还有一个姓徐的，看情况不妙，往外逃跑，被日军骑马追上，开枪打死了。有个叫姜吉盛的，躲在场院窝棚里，被日军发现，用刺刀刺死。郭连盛和郭连茂弟

兄2人，乘隙逃了出去。丛仁山第四个儿子躲在鸡窝里，趁烟雾大时，抱着8个月的小侄儿溜出来，躲在大楼房亲友家。有个叫王忠实的，从耳屋顶上逃了出去。其余的男人都被杀害了。

把男人杀完后，日军守备队就把妇女和小孩驱赶到姜德春前院东厢房里，日寇便向屋里开枪，妇女和孩子在一片惨叫声中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然后，日寇和“自卫队”把姜德春前后院的房子都放上草，点上火，没有被打死的人都活活被烧死。有的妇女和孩子从火堆中爬出来，日军就开枪打死或用刺刀挑死。火越烧越大，整个堡子都着起来了，一直烧到上午10点多钟，日军和“自卫队”才离开。我（张春发）从苞米仓子里钻出来和躲在小屋子棚上的张庆德侄叔2人，到火堆中找自己的哥哥和妻子，张庆德从火堆中看见妻子的腿被打伤了，和我把她抬到院落篱笆里，因失血过多，当天下午就死了。有个经常要饭的老宋太太，满身是血，一步一步地从大火堆里爬出来。

我家（姜德春）的大门口，有个30多岁的妇女躺在门槛上，满身血污，她见到张春发说：“我是老郭家的，你给咱们村里的人一个信，来归葬我的尸首吧。”张春发见很多人都死去，有些尸首都烧糊了，认不出是谁，他哥哥的尸首也没找出来。第二天，附近的群众把被害者尸首按男女分葬在村头路旁的大坟墓中。在那些日子里，死难者的亲友常去墓前放声痛哭，七八天内哭声不断。路过的行人见此情景，也不禁悲伤、落泪。

在南岗头事件中，只有宋国本全家25口人和两户朝鲜族十一二口人（其中有一个叫安振浩的）没被杀害。这次事件前后被杀死275人，烧毁房屋156间，个别活着的人只好四处逃荒，一个好端端的村庄变成了一片废墟。

（摘自《辽宁省文史资料》第七辑，东沟县政协供稿）

窟窿榆树村农民季福仁等九人 被日本侵略者残杀的经过

张德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实行了残暴的烧光、抢光、杀光政策。日本侵略者为了扑灭我爱国同胞抗日烈火，捕杀了大批抗联的地方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平乡的季福仁、张喜鸿等八人就是在那时惨遭杀害的。

大四平，那时叫窟窿榆树，是桓仁县第六区公所所在地，是新宾、桓仁、本溪三县的交界地带，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活动的中心区。当时，许多青壮年农民参加了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有些为抗联做地下工作，买粮食、储存粮食、做衣帽鞋、买药、盐、棉花、靴鞋、修理枪械，特别是传递情报等等，做了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工作，担惊避险，不少人被日伪当局抓去坐牢杀头，不声不响地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青年农民季福仁（29岁）、张喜鸿（27岁）、从振歧（25岁）、国学海（44岁）、姜振川、顾殿义、王殿阳、程义发（皆不到30岁）等8人，就是在那时为国捐躯的。

1936年农历十月初，抗联正处于极端艰苦的斗争中。杨靖宇率队转移到桓仁老秃子后，为抗联收编了的山林队“于乐好”来到了窟窿榆树东南八里、老草帽顶山脚下的四平街，找到抗联的地下工作人员从振歧、顾殿义、张喜鸿等人要粮食。顾殿义家住在四平街的狍子圈沟里，为抗联藏粮较多。顾殿义等

人说：“我们是给红军（指抗联）存了一些粮，若给了你们，杨司令来了，吃什么呀？”“于乐好”没弄到粮食，很不高兴地带人走了。

后来，“于乐好”投靠了日本。抗联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抗日群众，听说“于乐好”同其崽子（胡子帮头领的警卫、通讯人员）投靠日本做了汉奸，都不安起来，担心他们递出抗联人员，轻者一人杀头，重者诛灭全家，谁不担惊受怕。没办法，能躲的躲了，能走的走了。窟窿榆树地方抗联主席、党支部书记张喜祯躲在山上一年多，家里人以为他已饿死在山上，有的全家出走奔了北省（黑龙江）。但仍有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离开家。这些人为了不受“于乐好”陷害，就卖钱、弄大烟土（鸦片）给“于乐好”送礼。

窟窿榆树有个远近有名气的说客，名叫王子荣，绰号叫王老总。他的侄子王殿阳参加过抗联，后来做地方工作人员，王殿阳其父亲王清禄正为凑不出钱而忧愁焦虑。恰巧王子荣在一朋友家见了窟窿榆树警察署长敖瑞芝，对他说：“胡子（俗称）降了日本，还煞人。”

敖瑞芝问：“怎么个事？”

王子荣便将“于乐好”投降日本收礼受贿的事和盘端了出来。

敖瑞芝回桓仁县向上司把“于乐好”被抗联收编，进行过反满抗日斗争，现在又投靠日本的一些事做了报告。警察署立即抓到了“于乐好”，并将其枪毙了。日本翻译官看“于乐好”的崽子年纪青青，聪明伶俐，就收留了他。

“于乐好”的崽子便将窟窿榆树一带参加过抗日联军，和为抗联工作的地下工作人员及抗日群众，全部供了出来。日本当局命令伪警察立即连夜出动，翻过草帽顶山的老岭，来到窟窿

榆树和四平街。

1936年农历腊月，日本指导官伟奇率领队伍于鹰窟榆树逮捕了抗日联军连长马长山、情报员从振歧，地工员季福仁、张喜鸿、国学海、程义发、顾殿义、王殿阳和铁匠姜振川，还有一个不是抗联人叫董金龙的，共10人。

这被捕的10人连夜被押送到桓仁县。在过了草帽顶山老岭后，在桓仁县八里甸子区（今八里甸子乡）的门转子地方，日本人指使伪警察将顾殿义、姜振川、王殿阳、程义发、张喜鸿、国学海六人绑在树上，割了六棵榆树腰子，象捆柴禾一样，从嗓葫芦往脖后边的树上一勒，在树后绕两个半劲，就把人活活勒死，人们管这样的死刑法叫“两半劲”。就这样，6个人被勒死了。

走在半途中，那名叫董金龙以他巧辩之舌又向日本人使了钱，被放跑了。后来此人投靠了日本。

日本指导官伟奇及伪警察，不熟悉草帽顶山南坡各沟岔山路的路径，留下季福仁、从振歧两人给他们“拉道”（做向导），将他们带到桓仁县的八里甸子（那里八里甸子设区）警察署，在这里“居留”了六七天。

这些人被抓走后，鹰窟榆树村村长张立义，字敬乙，决定用联环保的办法救出这些人来。张立义为村内能言善辩、通文熟墨之人，早在杨靖宇抗日联军进入新宾、桓仁之初，就参加了抗联地下工作，后受杨靖宇及其政治部部长胡国臣的委派任了村长，明为日本干事，实为抗日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大村屯设“大会”，小村屯设“小会”。“大会”由几个“小会”联合组成，“大会”、“小会”皆由村民为保卫家乡安宁而自动组织起来的，“大会”有几支土枪。

村长张立义召集大村小屯各家各户签名划押，联环下保，证

明被抓的9人(除董金龙外)皆是安分守己的良民。联环保签押完毕以后,立即委派青年农民(也是抗联地下人员)张立忠连夜赶往八里甸子。当张立忠奔到桓仁县四道阳时,见到一个当地的熟人,问:“你干什么来了?”

张立忠说:“送保。”

那人说:“晚了,季老大和从三子(指季福仁、从振歧)头天在八里甸子挑了,顾老大他们早就在门转子勒死了。”

季福仁、从振歧和马长山被押在八里甸子时,日本指导官伟奇又带人到外三堡讨伐。在归来的时候,伟奇不慎将心爱的战刀(腰刀)失落在雪地上丢了。回到八里甸子心情也不妥当,就向季福仁、从振歧开刀了。马长山后来被押到了桓仁县监狱,也病死在狱中。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杀人如麻

——日本侵略者在新宾县响水河子、红庙子、
旺清门等地大肆烧杀情况调查

张德玉

1935年(康德2年),日帝在新宾的响水河子一带以“抓梁司令(梁世峰)消灭‘匪徒’安定秩序”为借口,在响水河子抓了“十家长”朴成植、宝林、富贵、尹斗七等130余人。朴成植喊:“别打!他们没有罪,什么事都是我搞的,不要打他们。”

日本侵略者当场枪杀了十家长朴成植,随后又枪杀了70余

名汉族、朝鲜族青壮年同胞。那50多名没死的人，手脖上被日本兵用刀割上“×”型刀痕，用黑炭摸上记号，说以后不老老实实当“良民”，再抓到就杀。现在，尹斗七、严凤熙、韩植道等人的手脖上仍留有黑色“×”型残痕。

为了缩小围剿圈，使抗日武装力量没有活动范围，日本侵略者烧毁了响水河子、双砬子、大荒沟、夹河北、房平沟等村屯的全部房屋棚舍，约有2 200百多间，血洗了响水河子、红庙子，残杀我同胞3 000多人。剩下几个没有被杀死的人，只好搭窝棚住。

1933年（大同2年），农历二月十三日清晨，日本侵略者在旺清门镇的东山和后山架上机枪，向江东、西山堡和旺清门街里扫射了半个钟点，当即打死了正在做饭的2名妇女，1名汉族妇女，1名朝鲜族妇女，还打死1个老头。

扫射后，日本讨伐队凶神恶煞般地窜进堡子里，不由分说地枪杀了40余名无辜百姓。

朝鲜族妇女金在元的母亲、丈夫、叔叔、弟弟等7口人被抓去杀害。杀了人不算，还在房上浇汽油，点火烧房子。旺清门镇、江东、西小堡等村屯1 000多间房屋被烧光。金在元的父亲冒着烈火，冲进屋里，抢出两个孩子，不顾日本讨伐队兵士的打骂，抱着孩子逃出去，留下了3条性命。

当天晚上，各家上山找亲人的尸体，只找到了14具，其余的全部活埋了。当夜大雪过后，尸体的热气将雪化净，许多人家才找到死去的亲人尸骨。

1937年（康德4年），日本领事馆利用鲜侨败类金亨德等人为巡查，专门搜捕反满抗日人士。在旺清门一次抓走80余人，几乎全部被杀害。金亨德还把两个正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当场杀死。旺清门后山、响水河子、红庙子的高丽山城等地，到处都有

“万人坑”和“百血坑”。城关区警察署警佐金相玉（朝鲜族人，日帝走狗），外号叫“金大刀”。金相玉中上等个头，地包天的嘴，长相凶恶，眼神发贼，他父亲外号叫“金半斤”（一次喝半斤酒）。一天，“金大刀”进了前进三门市部西的永新商会的杂货铺，铺里的人见了“金大刀”都恭迎敬立。有个跟“金大刀”同过学的人，叫洪洛元，他抚摸着“金大刀”的刀说：“你这个刀怎么这么快（锋利的意思）呢！杀人一刀一个。”

“金大刀”说：“我做这个事，练的，刀片也快。”

说着，扬起刀往明柱上斜砍一刀，一刀就砍进一豁豁深。“金大刀”说：“象你吧，洪洛元，我怎么认识你（意谓人很熟，关系较好），嘴里跟你说着话，眼睛就端量你的脖子，怎么下刀才能一下砍下头来。”被“金大刀”金相玉砍死的人，据说在千人以上。

日本侵略者随心所欲地枪杀无辜百姓群众，无论是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在家里操持家务的妇女，在路上赶路的商人，在院子里玩耍的儿童，都不能幸免。他们拿杀人取乐，更有甚者，有时竟把被杀的人头割下来挂在路旁村头的柳树上。一棵树有的竟挂十多颗人头。尽管人头被割下，但颗颗人头都是怒目圆睁，显示着被欺凌的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志。

（摘自《抚顺文史资料》第九辑）

两个村庄民房被付之一炬

张守臣 杨旭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一个用封建迷信方式聚众的、集而为兵、散而为民的民间武装组织——红枪会在建平县的黑水、小塘、三家、深井等地，纷纷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其矛头直指日伪政权。

1933年春，日本侵略者侵占建平后，对老百姓实行残酷的统治，要大烟干，抓劳工，名目繁多的捐税，逼得民众痛不欲生。特别是由日本人严尚、木田等控制的黑水伪警察署，对黑水一带百姓的压榨更是残酷。许多无事的群众被投进监狱，逼得家破人亡。西南关村的孙月、陈福山等农民，因交不上大烟干，被抓进警察署，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被敌人放回后，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百姓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早已恨之入骨，在当地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关东军，宪兵队，警察狗子协和会，如狼似虎没人味”！

面对日本侵略者、伪警察署的所做所为，当地农民李子成愤然而起，在黑水的大营子、四分地一带秘密发动民众，成立起红枪会组织，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有200多人加入红枪会。

红枪会规定了严明的纪律：“不准调戏妇女；不准拿百姓的东西；不动荤等。”同时编成歌人人会唱。以连、排为组织形式，还设置了会旗。

1937年8月14日，李子成率领红枪会百余人，身背大刀，手持牛耳朵扎枪，胸戴红兜子，高举大旗，口喊：“杀！杀！杀！”涌向黑水街。在李子成的指挥下，摆开了阵势，很快地将城门攻下。城门一开，会徒们鱼贯而入，冲向伪警察署。警察疯狂阻击，双方展开了激战。战斗中张世玉、刘振才、任天元战地身亡。因急攻不下，李子成就下令在拂晓前撤退。

8月15日，日本侵略者严尚、木田调集日军和伪警察进行反扑。日伪军全副武装，分乘3辆卡车，架起机关枪，驶向四分地和陈家沟村。村民和会徒们携家眷四处躲避，日伪军抓不到人，就将钱物抢劫一空。最后，就是放火烧房，把各家的炕席竖起，倒上汽油点燃，顿时火光四起，浓烟滚滚，两个村庄的全部房屋被毁之一炬，荡然无存。尔后，日军和伪警察又在附近大小山头搜捕，会徒丁清和不幸在山沟被捕，装在麻袋里被害死。日军和伪警察又发现了李子成的踪迹，追到黑水乾坤山下，李不幸中弹身亡。日军将其首级砍下，悬在黑水街东门外。

一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却在广大人民心中埋下更加仇恨的种子。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的罪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反抗精神。

（摘自遼寧縣《政协简报》总第54期）

头挂村边树

孙 彪

我今年已是83岁的老人了，记得50年前发生在我们村的一件惨案：自打朝阳县落在日本侵略者手里，庄稼人整天提心

吊胆地过日子。总是听说南三区的这里被日本军烧光、那里被日本军杀光了。有风声说日本讨伐队要来东五家一带讨伐。

到了这年（1938年）4月，来讨伐队的风声越来越紧。还传言讨伐的重点是我们塔营子。为啥？谁也说不清。有的说日本军得到情报，说塔营子窝藏八路军，日本人来抓八路；也有人说因为东五家有日本人开的金矿，为了保护金矿来讨伐一下，吓唬吓唬老百姓。我们塔营子祖祖辈辈都是劳而苦的穷百姓，赶过召都巴集的人就算见过大世面的。听说日本军要来，进了4月人们夜里就不敢在家住了。总是拖儿带女的住到村外的大山里，那个罪受的没法说。有些年轻力壮胆子又大点儿的，白天回村看看。

我忘记是那一天了，下边（指东五家）有人捎上口信，说日本讨伐队到了东五家。有四五十号人，领头的日本官叫佐藤。也不知道佐藤是多大的官、啥军衔、部队是什么番号，就听说这个佐藤杀人不眨眼，拿着杀人取乐儿。捎信的人叫沟里人赶快藏好，否则叫日本军抓住就没命。

塔营子一共10多户人家，听到这个信可吓坏了。大人带着孩子、带点干粮，到山里躲起来。孩子一哭，当妈的赶紧用奶头把孩子的嘴堵住。哪里有点动静，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第二天上午，我们从躲藏的地方看到村子起火了。我们村的张广林心疼他的几间破房子，去村边张望，被日本军看见抓住了。说他是“红胡子”，用木棍打他，把胳膊粗的木棍打断好几根，最后把他按在小河沟里，又给他灌凉水，直灌到晕死。

村民程万财，人们都叫他小老程，带着九岁的孩子藏在山中，带点干粮吃光了，孩子饿得直哭。他怕孩子哭声引来日本兵，又惦记着家里的破烂东西，便偷偷跑回家。正巧被日本人发现了，他也看见了日本兵了，就不顾一切地往山上跑。日本

兵这下可有目标了，象恶狼见了猪崽一样，把程万财抓住，绑在树上，十几个日本兵轮着打，打得皮开肉裂，昏过去又用凉水喷过来再打，昏了再喷醒，硬逼他承认是“红胡子”，并向他要枪。折腾了大半天，天快黑了，日本兵才把塔营子房子全部点着，而后带上程万财返回东五家子村公所。

回到东五家子，把程万财关在小学校的一间空教室里。日本兵将老程天天打昏几次，有时抓住程万财的头发打，头往墙上撞。程万财痛得惨叫，吓得许多学生不敢上学。

塔营子聚集20多名乡邻，豁出死去村公所保程万财，说老程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甭说自己有枪，怕连枪是啥样他都没见过。日本军官不许老百姓保老程，架起机枪驱散了保人们。抓去的第4天头上，日军用战刀把程万财的头砍下来，并把人头挂在村南的一棵榆树上。经过说情，日本军才准许把老程的无头尸体抬回埋了。

程万财那颗血肉模糊的头颅，在树上挂了十多天。直到讨伐队撤走了，程家才把人头取下带回去埋了。

日本侵略者真是罪恶滔天，他侵占东北十多年，掠走中国多少物资，掠走我们多少黄金、白银，残杀中国多少像老程一样的无辜百姓，这笔血海深仇我们应永远记在心里啊！

补 白

1938年4月，日本军官佐藤带领讨伐队对塔营子进行了讨伐，烧光了全村房屋，并捉走了地地道道农民程万财，诬其为“红胡子”，施严刑后老程不招认，便被砍头悬于东五家子村前榆树上示众。在东五家子小学教书的先生王东升，对此情此景，亲眼目睹，对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气愤已极，并感慨尤深。于是，他便提笔写诗，哀悼平民之不幸，怜叹华夏之沦亡，斥

汉奸之为虎作伥，咒日军之残暴凶狂。该诗作已被收入朝阳县政协、县志办合编的《朝阳历代诗词歌赋》一书中。

（韩明福整理，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佐藤刀铡爱国志士

王瑞林 陈 葵

1937年（伪康德4年）日本侵略者在北票朝阳沟、长条沟、关地沟等地对我抗日志士制造了枪杀、活埋、挖心、火烧等数起骇人听闻的惨案之后，于翌年11月24日，又在娄家沟用铡刀杀害我同胞11人，制造了娄家沟惨案。

娄家沟位于北票县城北约25公里处，是北票通往黑城子公路沿线的一个村。该村附近的兰家窑是抗日英雄兰天林的家乡。兰天林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医巫闾山以东举起“东北农民抗日拥张铁血军”的大旗，1933年又转战到家乡，号称“抗日灭满救国军”。兰天林同刘振东、老梯子、周荣久等抗日队伍联合，向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一次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围攻和突袭。如1934年奇袭奈曼、二打黑城子王府，1935年围攻北票等地，都给伪满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兰天林这支队伍成了插在敌人心里的一把尖刀，打得敌人焦头烂额。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派来以“活阎王”佐藤为队长的日本讨伐队，四处追剿兰天林的抗日队伍，并在娄家沟村设置伪村公所和警察分驻所，以强化治安。他们还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捉拿兰天林，千方百计地企图扑灭这抗日火种。

娄家沟遇难的11名同胞，多是兰天林队伍的成员（其中一人因其哥是兰天林的部下，也被抓来了）。他们被俘以后，受尽严刑酷打，但始终宁死不屈。于是，敌人穷凶极恶地把他们用刀铡了。

这一天早晨，天空布满乌云，北风刺骨，雪花纷飞。佐藤的百余名日伪军，乘军用卡车冲进娄家沟。接着，娄家沟等3个村的居民，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能走路的孩子，均被伪村长和伪警察驱赶到杀人场上。杀人场设在村南靠树林的一片开阔地中间。东面是佐藤的指挥台，西、南、北三面挤满被日伪军荷枪实弹包围起来的群众，场上并架起四挺机枪。上午10点多，11名爱国同胞被日伪军用枪托触打着，推拥着，押到一口铡刀前。站在最前面的是爱国志士齐孝祥，他被日寇捕后两个多月，经受各种酷刑，腿骨被打断，头部血肉模糊，但他对敌人，仍怒目而视。临刑前他向家乡拜三拜，而后抬起受伤的手掖袄领，便毅然躺在铡刀上。此时，佐藤从大师椅上跳下来，手握战刀“哇啦”一阵，翻译官译成中国话说：“皇军说，谁要再反满抗日杀头是问！”随后便开始动刑。刀下头落，血花四溅，洁白的雪地顿时一片殷红，其惨状目不忍睹。

事后，佐藤命令将11个血淋淋的人头，连同从外地携来的10个人头，一起挂在路边的大杨树上示众。

（摘自《朝阳文史资料》第二辑）

处决警尉补 群众遭祸殃

李大昌 赵武军

1943年1月13日，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凌源刀尔登的尖山子，制造了一起逮捕群众43人的惨痛事件。

伪满时以尖山子为中心点的柏杖子、柏家台、西沟、下仓与虎头石等10余个村庄为一个甲（伪甲事物所设在尖山子）。这个甲地处凌源县刀尔登西南20华里，山高路险，树木柴草繁茂，很适于开展抗日游击活动。1942年秋季始，我冀东十二团一营以两个连的兵力，奉命向青龙郡山东东北地区积极活动，破坏平泉铁路和电线，袭击平泉、汤道河、朝阳山等处敌人据点，消灭敌伪组织。尖山子甲和四邻的毛家店、马杖子、胡杖子甲等地方，我军经常出没在这里，每当我军走后，敌刀尔登警察署的特务也时常赶到此地，会同尖山子甲长张余，以“私通八路”罪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对此当地群众恨之入骨。此情况被迁（安）青（龙）平（泉）联合县第八区（设在青龙汤道河）民政助理于建华和通讯员张荣轩得知，下决心要教训这个效忠日本侵略者的伪甲长张余。经区领导同意，于建华同志带领5名区干部，于1942年冬一天午后来到尖山子甲西沟庄，调查得知张余在家，正与刀尔登警察署的警尉补房继武在西厢房抽大烟，于建华和通讯员张荣轩化妆后，巧妙地将房继武绑起来，带到西沟庄进行审讯。甲长张余趁于建华、张荣轩捆绑房继武之机，溜出西厢房奔正房跳窗逃跑。房继武平素罪恶累累，民愤很大，当即将其处决在西沟庄外。

伪警尉补房继武被处决后，敌人疯狂地寻机进行报复。1943年1月13日（即1942年农历腊月初八）清早，伪刀尔登警察署讨伐队和日本宪兵队40余人，在日本宪兵队长赤津精男的率领下包围了尖山子、柏家台、西沟三个村庄。将三个村的男女老少200左右人赶到尖山子庄外河滩上，开会进行训斥而后抓走成年男性群众43人，到刀尔登装入汽车押送到凌源严刑审讯。判刑后，分别送到承德、阜新、鞍山、四平、本溪湖等地服刑。被绞死1人、死在狱中9人、送矿山当劳工的23人。其中：张国云，判刑后押送承德绞死；王增死在承德监狱；王勇、王林、申宝余死在鞍山监狱；王宗廷、申维军死在四平监狱；王云、王维死在本溪湖监狱；王发入本溪湖监狱后重病回家；胡海青押送承德监狱；裴云押送到抚顺充当劳工死在抚顺。申宽、王甫、王任德、王金凤、田凤芝、刘瑞廷、王宗富、申宝和、王良、刘奎、刘瑞芝、王凡、刘义、刘坤、王德海、傅荣、卢占玉、裴云、张振树、柏文化、张恩、田凤余、卢友、裴玉、柏恩、柏存、卢占勤、裴友、柏文海、张振雨等39人押送到阜新充当劳工。据《凌源市志》载：“平反前，送到各监狱服刑的43人，上述43人中除死在监狱里的以外，余者直到1945年的‘八·一五’祖国光复，才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凌源市志》第112页）

（《凌源市志》第112页）

（《凌源市志》第112页）

（《凌源市志》第112页）

（《凌源市志》第112页）

（《凌源市志》第112页）

（《凌源市志》第112页）

（《凌源市志》第112页）

（《凌源市志》第112页）